

文化大革命期間天主教徒的遭遇

田英傑著 傅蔚琳譯

1966 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至今已 50 年，但有關這敏感時期的文件和報告不是被毀就是保密在中國的檔案中。要為文革中的所有事件撰寫一部完整的歷史，是十分困難的事情，要闡明在這時期內的宗教信徒的遭遇，則更是難上加難。

我與中國天主教徒連繫時，經常鼓勵他們，趁著那些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證人們還活著的時候，收集在這段中國近代歷史時期中受苦的人們的回憶。最近我再一次邀請幾位中國的朋友，為這主題搜集資料。本文將報導他們的發現，並加入一些已經出版的、來自一些在文革的悲劇中活過來的天主教友的見證。儘管如此，我們可以肯定，這仍未算是天主教徒在那個年代裏的遭遇的完整圖畫。

政治環境

文革的主要目的，在 1966 年 5 月 16 日的《通知》中已列明出來，這份《通知》展開了針對文化產物和文學作品的攻擊，但實際上它是一場政治爭鬥的開端，而敵人就是毛澤

東認定並稱為「牛鬼蛇神」的人。這詞語是用來醜化所有反對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毛澤東的觀點的人，例如政治敵人、知識份子、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宗教信徒。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後，紅衛兵就展開了橫跨全國的大整肅，拘捕和迫害所有他們認為屬於上述類別的人。1966年8月4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8月11日，簡稱《十六條》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稱這場革命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或一場「文化革命」，其目的是為創造一個「新文化和新人」。此後不久，中國就開始了一場「破四舊」的運動，破除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和舊思想。8月18日，在毛主席的祝福之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齊集在天安門廣場，為這場運動帶來極大的推進和鼓舞。結果紅衛兵立刻開始利用這個口號，去攻擊任何他們想攻擊的個人和組織，宗教建築物、物件和信徒成為他們第一個目標。那個年代的標幟，就是有系統地迫害宗教，以及激進地消除所有宗教標記。

對基督信仰的迫害

由於缺乏公開的文件紀錄，就連最近期的中國基督教史書也只能以幾段簡短的文字，去綜合文革時期的歷史。沙百里(Jean-Pierre Charbonnier) 寫道：

文化大革命針對基督徒，因為他們常被懷疑進行反革命活動。所有教堂都被關閉、破壞或轉為貨倉、監獄、工

作室或儲物室。所有主教、神父和修會會士，不論他們是否愛國，都被拘捕、侮辱、送到勞改營或監獄裏。很多人都由於受到很差的對待而痛苦地死去。基督徒家庭由於那令人憎厭的互相告密制度，而被破壞或陷入沉默之中。宗教書籍被燒毀，雖然有些經書被埋藏或封藏在牆裏而得以保存下來。(註 1)

James T. Myers 雖提供了更多資料，但他也只是概括地綜合了情況：

紅衛兵對那些在 1966 年 8 月後仍在運作的教會殘餘份子行動迅速，教堂受到攻擊，它們的宗教標記被拆除。他們試圖移除任何宗教的識別，石造的十字架、雕像和其他教堂外部的建築特色，都被鑿掉或炸毀。幾乎所有教堂都被搶掠和洗劫一空，大部分都被改建成貨倉、工作室或類似的東西。(註 2)

基督徒——「人民的敵人」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國的天主教徒被認定性為「人民的敵人」而成為攻擊的對象。很多平信徒和所有主教、神父、修女及修士，連仍然能夠公開地運作的天主教愛國會成員，都被迫集合在一起、受到批鬥、捱打、遊街示眾、送往勞改營或監獄。當時的口號是「將宗教連根拔起」。

就連平信徒也成為目標，他們被趕離家園，然後他們的家園就被搜掠、打劫和破壞。這裏有一個來自上海的何姓家

庭，描述他們的經歷：

1966年9月，約在毛澤東放手讓紅衛兵大幹後的一個月，33歲的若瑟和他的家庭遭到紅衛兵用斧頭劈開他們的門。接下來的好幾個小時，超過60個被惹怒的青年，在家中搜尋珠寶和金錢等貴重物品，然後破壞屋中所有代表道德四舊的東西。全部6位由24歲至35歲不等的何姓兄弟，連同他們58歲的母親瑪利亞都被捕了。若瑟的60歲父親領洗時也取名若瑟，早在1954年已經因天主教信仰而被捕，並被送到江蘇省的大豐監獄農場一直留至1978年。一個月後若瑟的媽媽和兄弟們被釋放了，但他們不能回家，因為家被查封了；他們只能擠在一個兩房的單位內。（註3）

一位住在河北省衡水教區深州的李姓天主教平信徒，描述他的家庭，特別是他的姑母和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的巨大痛苦。紅衛兵在1967年12月1日監禁了他的父親，父親在1973年3月死在監獄裏。

安陽教區現年80歲的李修女，在文革剛開始時進了初學院，因此她被送回家去。但她保持著聖召，並在鄧小平開展的「門戶開放」政策後發了永願。她和當年在堂區做傳道員的父親及現在同是修女的姊妹，一起受批鬥和放棄信仰的壓力，他們在村裏和城鎮裏被掛牌示眾數天之久，戴著高帽子，上面寫著「打倒反革命蟲子，外國人的走狗」。這指控也被懸在村子和教堂的牆上。他們的教堂和家園都被洗劫，所有宗教的服飾和物品都被搜出和燒掉。

殉道者和信仰的真正宣訊者

以下事件由當時是河北省保定地區一所學校裡的學生所目睹：

1966年8月或9月文革開始後不久，一隊來自保定第二中學的紅衛兵衝進市中心裕華街聖伯多祿聖保祿主教座堂。他們收集了所有服飾、宗教物品和書籍，放在教堂正門前燒掉。他們把所有神父和修女帶到教堂前面，辱罵他們，並用鋒利的木棒擊打他們。劉道寧神父被痛打時大聲喊叫說：「我們是愛國的！」即他是天主教愛國會的成員。但那紅衛兵中的暴力流氓繼續打他，並嘲諷他說：「那麼，我就打你這個愛國的人！」劉神父在幾次叫喊之後昏倒了，紅衛兵把他拋在焚燒宗教物品和書籍的火堆上。另一位被殺的受害者是保定聖若瑟修會的張二姑修女，紅衛兵命令她踐踏一個聖母像，但她拒絕了，於是紅衛兵就用棍把她打死了。

一位住在河南省北部的72歲老農夫蘇先生憶述1966年8月16日下午，從市鎮中學來的紅衛兵去到天主教堂，破壞了祭台和所有神聖雕像和聖像。他們卻不能冒犯聖體，因為幸好神父在事情發生之前已經把聖體全部領受了。他們把所有服飾和神聖的用具拿到聖堂外面，並放火燒毀它們。他們威迫神父們和修女們非常靠近火堆跪著受烤。一名年老而行動困難的神父，兩腿被燒傷，他回家數天後去世了。另外一位比較年輕和強壯的神父，被迫穿著神聖的衣裝，與修女們

一起遊街示眾。一個好教友被迫在遊行隊伍的前方，敲著鑼鼓步操。那是炎熱的 8 月份，他們因一些好心人給喝了一點水才活過來。但後來紅衛兵卻打死了其中一個幫助他們的年輕人。

1966 年 6 月，早在 1962 年 7 月接受自選自聖的鄰民援主教，因參與反革命活動和與外國有叛國的關係等罪名而被拘捕和收監，他後來死在監獄裡。

在開封，王芡修女自 1964 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受到攻擊和迫害，因她沒有加入天主教愛國會。在文革期間，她被紅衛兵綁起來和帶走。根據當地人的紀錄，她是被活埋而死的。

一個天主教徒作證說，獻縣主教趙振聲 (1894-1968) 剛好在保定主教府內。他已經是頭髮斑白的老人，但一個紅衛兵把他捉住，並用棍打他，然後把他帶到距離地面數米的陽台，一面咒罵和譏笑他，一面把他拋下去，他們重複了這個行動好幾次。主教沒有當場死去，卻在 1968 年 10 月 15 日，在他自己的教區獻縣的監牢裡去世。

安東尼·克拉克(Anthony Clark) (註 4) 清楚闡述文革中天主教徒所受的暴行。有一次他造訪北京，正在欣賞北堂的雄偉前門時，他注意到一個園丁正在仔細留意一棵樹旁邊的一點，就像他正身處一個神聖的地方似的。於是園丁就告訴他一個令人激憤的故事：1966 年夏季，一個紅衛兵就在那地方攻擊一個年老的神父，強迫神父跪下，他的手臂被扭到頭上；在這痛苦的姿勢中，他被恥笑和命令要放棄他的天主教

信仰。當他拒絕了時，紅衛兵就恐嚇他，最後把他活埋在園丁所在的那個地方。

在太原，在其中一個「將宗教連根拔起」的聚會中，王世偉神父鼓勵天主教友保持忠誠。因此之故，他被紅衛兵拘捕和收監。（編按：王神父照片見今期第 68 頁。）

安東尼·克拉克引述王神父傳記的作者稱，他被關進的監獄普遍被稱為『死亡的監獄』，腳和手都被鎖鏈束縛著，使他無法直著身子站起來，另一條鎖鏈把他的身體連在頭上的橫樑，使他無法躺下睡覺。他就以這個姿勢被關在監房裏數個月之久。王神父堅拒放棄天主教信仰，1969 年 1 月，以違抗政府和堅拒『思想改造』的罪名被判死刑。1970 年 2 月 15 日，王神父在監房裏被打，然後被帶到一個公眾台上，在那裏被槍決。

同一位作者也描述了貴州省胡大國神父的「受難史」；胡神父是一個年輕和很有承擔的神父，文革之後他成為了主教；當時，三百個紅衛兵拘捕了胡神父，用繩綁著他，在他頭上放了一個白色的高紙帽，然後把他帶到群眾面前，讓他受凌辱。他被批鬥而且身體受到虐待。群眾要求他放棄信仰，而當他拒絕了之後，他就被判監二十年。在監獄裡，胡神父不能在實踐任何信仰的行為。就像所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拒絕背教的中國神父，胡神父要忍受四項「再教育」。首先，他要上馬克斯思想的課堂；其次，政府介紹一位漂亮的女士，並要神父和她結婚；第三，政府給他一份黨內的高薪厚職；最後，他被施以身體上的酷刑。胡神父保持堅定的信仰，他

保持貞潔司祭的身份，並忍受了酷刑，這些酷刑使他身體殘廢而無法直立。萬縣教區段蔭明主教（編者按：照片見本刊今期第 72 頁）於 1949 年獲教宗庇護十二世任命為主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信仰受了極大的迫害。紅衛兵衝進他的主教座堂，拆毀了一個聖母像，放了一把斧頭在他手中，並命令主教砍下聖像的頭。他拒絕了，並大聲說：「你可以砍了我的頭顱，但我永遠不會放棄我的信仰。」他被虐待、監禁和送到勞改營裡直至 1979 年。

在勞改營裏的天主教徒受到的對待

「文革」所帶來的影響在勞改營裏更為強烈。那些被監禁著的宗教信徒，特別是天主教徒，意味著經驗掙扎、暴力、殺人的連鎖反應，這些都使人陷入完全的混亂和絕望中。當地幹部因著狂熱思想，每天選一個不同的「批鬥」對象。在「群眾大會」或「批鬥大會」時，幹部用武力把人拉到台上，讓他們在那裏忍受群眾連珠發炮般的指控，當然他們也受到幹部的辱罵和虐打。

天主教徒在文革期間遭受痛苦經驗的回憶錄，有些已經出版成書，這些著作包括廣州總教區耶穌會士鄧以明總主教的自傳《天意莫測》(1987)、描寫耶穌會士朱樹德神父的《沉默的證人》(1987)、廣州總教區譚天德神父的《我的自傳》(1995)、香港教區黃勇牧神父的「自傳回憶錄」、描寫梅縣教區李昶神父的《春雨》(1990)、龔品梅樞機的外甥女、何王小玲（譯音）及廖守基等人的有關書籍。

鄧總主教在《天意莫測》中記載：「文革時期，更是許許多多從外地來的幹部向我了解情況，有遠至黑龍江來的。都是關於別省教區的事，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區，以及已離開中國的主教的事。但是幹部向我查問的有關人，往往是我都不認識的。有許多幹部從遠處專程來找我，初時很客氣，以為我會有很多資料供給他們。最後使他們失望便惱羞成怒。」（頁 74）黃勇牧神父憶述：「1967 年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時，我們犯人每天七次捧『紅寶書』列隊在毛澤東像前請罪，三呼萬歲。」（見《自傳回憶錄》）

教堂和宗教建築的破壞

《寧波市天主教會物業之歷史》報告書記載著，文革開始後，住在藥行街教堂的神父和修女都被送到七塔禪寺，與僧人同住。當時所有教會活動都停了，所有歷史紀錄、書籍和聖物都被破壞了。所有教堂物業都被充公，江北教堂最初被改建成幼稚園，後被改成工廠作軍事用途。鄰近主教府的房子全被佔用和破壞，被分配給人民作公共房屋。

在廈門，一個曾經當過紅衛兵的證人承認：當「破四舊隊」到了一個名叫鼓浪嶼的小島，去褻瀆基督徒的墳墓時，他假扮病了，並遠離那裡。後來到那地方看看，在其中一個墳場，那裡埋葬的主要是外國人，墓碑上的十字架全被折斷，墓碑上的刻字或是被水泥塗去，或是被顏料塗得模糊不清。附近的一個小園子被破壞了。1966 年 8 月 24 日，紅衛兵搜查了上海的所有教堂，破壞十字架和聖像，並焚燒所有宗教

書籍。8月29日，紅衛兵洗劫和破壞廣州的主教座堂，並扣留神父修女。

驅逐最後一批外國修女

在文革期間最為外國人熟知的天主教會悲劇，發生於1966年8月24日，一群瘋狂的紅衛兵衝進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修女所辦的北京聖心天主教學校，揮舞著刀、棍棒、斧頭、錘子和皮鞭，大喊粗言穢語。對那裏的8個外國和約70個中國修女拳打腳踢。一個年老的修女被皮鞭劃破她的臉，鞭打的力度使她的眼睛幾乎掉了出來。幾天之後，外國修女被宣判為「反革命分子」，中國的修女則被判監禁20年。那些外國修女隨即被驅逐出中國，她們要乘40小時火車往廣州，再用三小時火車程到羅湖邊境。火車於8月30日下午2時到達廣州時沙利文修女（Sr. Molly O'Sullivan）病重垂危。當火車靠近羅湖橋時，沙利文修女已經神智不清，幾乎立刻昏倒在地上。在香港的邊境，一輛救傷車把沙利文修女送到聖德肋撒醫院，她於翌日早上6時45分，在聖德肋撒醫院回歸天鄉，獲得永恆的賞報。至於聖心學校的中國修女，我們對她們所知不多，她們可能在監獄裏銷聲匿跡。

結論

雖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壞的時期是在首三年內，但它卻維持了足足十年，直至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而四人幫倒台為止。這一整個時期被公認為「十年浩劫」。

當文革時期過去，即 1970 年代後期，出現了一股反映出這個政治運動如何使人受傷受害的「傷痕文學」。可是，來自前紅衛兵的自白仍是十分罕見，只有很少數的前紅衛兵成員現身，為他們在文革期間所犯的罪行道歉，而這少數人也訴說了他們自己的負面個人經驗。但是，在中國，並非所有人都對這樣的坦白感到欣喜，他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做，也希望忘記這件事情。宗教迫害的事件是造成更大恐懼的理由。很多天主教的受害者都認為，十年文革是中國天主教會內最嚴重的迫害和殉道的時期。可惜的是，這些天主教徒經歷的、官方所做的暴行，直到現在仍是不便公開透露的「高度敏感資料」，就連一些在那時候有親朋戚友成為受害者的天主教徒，也仍不太願意講論這些事情。為甚麼呢？一位來自陝西的神父憂傷地承認：

真誠的說，當我被問及這個重大苦難的時期，我不能表達我的感受，因為以教會現在的處境，這痛苦的情況根本從未終止，仍然持續著。或者現在那對我們的慈母教會的信仰真理所作的威脅，比前幾個世代的人所受的，更為深遠和微妙。今天我們一定要祈求主堅強我們，並賜予我們勇氣，去為我們對耶穌的信仰作證。 □

(編者按：相關註釋見本刊今期第 93-106 頁。)